

中国

抗日战争史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战时军队

〔第四卷〕

陈默 王奇生 等 著

步平 王建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定价: 1580.00 元 (全八卷)



步平 王建朗 主编

中国抗日战争史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第四卷 战时军队

陈默 王奇生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前 言	001
-----------	-----

| 上篇 国民党军队 |

第一章 统帅部与军队系统	007
第一节 大本营的尝试	007
第二节 军事委员会	013
第三节 全国抗战初期的军队系统	021
第四节 “战区—集团军”体系	035
第二章 战略单位：野战军、师	050
第一节 全国抗战初期的扩军	050
第二节 整训、缩军与建军	064
第三节 军、师编制（前期）	077
第四节 军、师编制（后期）	092
第三章 军队派系	107
第一节 军队派系的新陈代谢	107
第二节 战区、集团军的派系属性	124
第三节 派系军队与统帅部的博弈	131
第四节 派系军队之相互关系	146

第四章 军官和士兵	164
第一节 军官的出身与教育	164
第二节 军官的任用与升迁	182
第三节 兵役制度与士兵征集	192
第四节 士兵的教育与训练	201
第五章 武器装备与军需后勤	210
第一节 武器装备的种类与性能	210
第二节 武器的自造和购买	234
第三节 国民党军的军需	241
第四节 国民党军的后勤	248
第五节 国民党军的医疗	254
第六章 武主文从：政工与党务	267
第一节 以党治军的蜕变	267
第二节 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271
第三节 文武关系的变奏	275
第四节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280
第七章 国民党军的若干特质	285
第一节 战绩呈报与宣传	285
第二节 缺额与逃兵	291
第三节 地方军人势力的膨胀	298
第四节 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	301

下篇 共产党军队

第八章 正规军：编制演变与力量消长	313
第一节 八路军、新四军的初期编制	313
第二节 化整为零：分兵建立敌后根据地	317
第三节 化零为整：整军、扩军与正规化	327
第四节 精兵简政与武装结构调整	333

第五节 反攻阶段与正规军的扩大	342
第九章 官兵人事	350
第一节 来源与构成	350
第二节 任免与审查	363
第三节 教育与奖惩	368
第四节 待遇与福利	375
第五节 伤亡、抚恤与退伍	388
第十章 党指挥枪：政工与党务	396
第一节 党军体制	397
第二节 军队党务	405
第三节 政工干部	413
第四节 政治教育	422
第十一章 武器装备与军需后勤	438
第一节 武器装备的来源	438
第二节 武器装备的水准	448
第三节 物质供给	454
第四节 兵站运输	464
第五节 医疗卫生	469
第十二章 地方武装	475
第一节 组织体制	475
第二节 动员与来源	484
第三节 地方武装主力化	488
第四节 精兵与主力地方化	493
第五节 领导机制	498
第六节 优势与局限	504
第十三章 民兵、自卫队	512
第一节 发展演变	512
第二节 组织与动员	519

第三节 教育与训练	528
第四节 武器与作战	534
第五节 优势与弱点	541
主要参考文献	545
人名索引	554

前 言

军队无疑是战争的主体，即使是“总体战”也不例外。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但军队仍然是抗战的主体力量，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所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军队在抗战。只有弄清各支军队的实际情形和各个战场的实际运作，才能再现这场战争的一些基本面相，否则我们所书写的抗战史仍是一部将军事、军队置于边缘叙述的历史。

长期以来，文人出身的专业历史学者大多不愿涉足军事史，一是缺乏足够的兴趣，二是缺乏军事学识与经验，担心“纸上谈兵”可能造成理论与事实的偏差。我们习惯于将军事史留给军方学者去研究。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军史战史研究以及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的相关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可视为前者的代表作，《国民革命建军史》可视为后者的代表作。军方的军事史研究具有一般历史学者所不及的专业优势，不可漠视其研究的贡献与价值，但也要注意军方研究的“本位”立场与“本位”意识，不大关注军事与一般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导致军事史学与一般历史学之间形成一道相互隔绝的鸿沟。

20 世纪后期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军事史”呼吁，不能将军事史完全留给军人去研究，而应该拉近历史学家与战争、军事之间的距离，尽力弥合军事史学与一般历史学之间的隔阂，进而打破学科之间的樊篱。“新军事史”不囿于以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和描述战争过程为目标，要求尽量拓宽军事史研究的主题，丰富军事史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不仅关注战争本身，也要关注战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近 20 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的抗战史研究成果显著，有关抗战时期政

治、外交乃至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推进，相对而言，恰是战争本身的军事史研究略显滞后，如国内学界有关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还偏重于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过程的粗略描述，而对国民党军统帅部至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战术的运用，军队的组织形态，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官兵人事，作战能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士兵的招募与兵营生活，以及战地和后方的党政军民关系等，深入系统的探讨尚不多见。相比之下，台湾地区 and 海外学界自 1950 年代以来尚有数部富有洞见的学术论著面世，如刘馥的《中国现代军事史》，齐锡生的《战时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易劳逸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张瑞德的《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等，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与描述。

有关抗战时期中共历史的研究，呈现同样的态势。最近 20 多年来，历史学界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已有相当深入的推进，而中共军事史的研究成果，则大多出自军方，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的研究，有的甚至细化到某师、某纵队，一般侧重于梳理军队的发展演变，如编制序列、人事沿革、参战情况等，重在彰表其艰苦历程与光辉战绩。军方之外，一般历史学界有关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与军事的研究成果则较少。海外学界可能限于资料搜集困难等因素，相关专门性的论著亦不多见。1989 年东京出版的穴戸寛『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河出书房新社、1989）。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基本脉络、编制装备、政治工作、民众工作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等，做了简要的梳理，可视为域外相关研究的代表作。

总体而言，有关抗战时期军事史的研究，海峡两岸的成果主要出自军方，一般历史学界较少涉足。在历史学界有限的相关研究中，对战争进程的描述较多，对军队组织形态的探讨较少。大体上，军方的研究与历史学界的研究甚少交流；两岸军方更是各说各话，甚至处于“互污”状态；两岸史学界对抗战时期国共军事史的研究，缺乏将国共军队放在抗战大背景下进行整合性、比较性的探讨。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军队分别在各自区域内抵抗日本的侵略。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和协作的关系。本卷拟分上下篇，分别探讨国共两军的基本特征和抗战方略，如军队的组织架构，人事派系，指

挥系统，战略决策机制，武器装备与军需后勤，士兵的征募训练与待遇、官兵素养与作战能力，地方武装与政工党务等，都是军队实际运行中的基本问题。

在本卷中，战争过程不再是焦点，而战争的主体军队将成为讨论的中心。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逐渐建立了新的架构：全国军队被陆续编入多个集团军，进入各战区序列参加对日作战。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一个以战区、集团军为主要层级的军队系统最终形成。同之前相比，新的军队系统专为抗战设计，较之过去更为整齐划一；而作为基本战略单位的军、师，也不断地更新着它们的编制。然而，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始终不佳的军队状态和作战能力，提示着这样的组织形态存在着某些问题。事实上，战区和集团军不仅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国民党军各个派系在战时的存在形式。国民党军内部纷繁复杂的各派势力，在战争中逐渐内化成为诸个战区、集团军乃至军、师。与派系相对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战区—集团军体系和地方行政的关系。战时地方行政中既已存在的“军治”体制进一步强化，战区—集团军体系中的各个层级在交战各地与地方行政进行着多种样态的互动，此种互动更多表现为军队系统与地方行政之间的矛盾。此外，战时国民党军的兵役制度、政工制度，均反映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武装体制的一些基本特质。

抗战期间，中共军事力量迅猛增长。抵达陕北时三大主力红军不足3万，至全国内战爆发前，中共军队已达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还有超过200万的民兵。中共武装在抗战期间有如此发展，不是简单的“坐大”所能解释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多至300余师，而县、乡自卫队和省保安队大多虚而不实，地方武装、游击队与正规军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而中共的人民武装体制，从自卫队到民兵到游击队再到野战军的依次递进而又同时并存的梯级武装体系，不仅极大地减缓了动员民众参军的困难，层层递进过程同时也是武装熏陶和训练民众的过程；民兵和自卫队不脱产，又大大减轻了中共的财政压力，意味着人民武装体制能以较低的成本发挥较大的效用。另外，与国民党军的战区体制不同，中共军区、军分区是掌握地方武装与民兵、自卫队的单位，主力部队相对仍是一套独立系统，可依战略需要在各大战略区轮换，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总之，中共武装体制的内在机制与实际运作情形，人

民武装与群众运动的联系，以及“党指挥枪”和政工制度等诸多问题，尚有深入细致探讨的空间和意义。

抗日战争作为一场对外战争，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所面临的都是与过去内战时期不同的对手，也因此必须调整和采取新的战略战术。本卷在剖析国共军队的同时，未能兼顾审视日本军队的情形，未能比较国共日三军的战略战术互动，不无遗憾。

本卷各章撰写人员：陈默（第一、二、三、四、五章）、王奇生（前言，第六、七章）、刘亚娟（第八章）、郭宁（第九章）、谢敏（第十章）、张希（第十一章）、姜涛（第十二、十三章）。

上 篇

国民党军队

第一章 统帅部与军队系统

军队是战争的主体。国民党军队是抗战正面战场的主体。军事委员会是战时国民党军的统帅部；“战区—集团军”体系则是战时国民党军的主体架构。统帅部和军队系统的组织形态，随着战争的推移而变化。

第一节 大本营的尝试

军事委员会一直作为国民政府的军事统率和决策机关存在。军委会的历史，可分为广州、武汉、南京三个时期，而南京时期又可划分为6个阶段。^①其中第五阶段（1937年9月国民党第51次中常会到同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前）和第六阶段（1938年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到1946年6月被明令裁撤，改组为国防部），基本与抗战时期相合，系本书将重点讨论的阶段。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裁撤北伐时期的军事委员会，组建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取代其职能。1929年4月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统率全国军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总司令部被裁撤。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后，由蒋介石领衔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再度成立。^②

军委会的职掌是：“关于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关于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关于军费支配、军实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关于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之审核。”

^① 参见古顺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研究（1917—1928）》，硕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央大学，2010，第1页。

^② 戚厚杰等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123—131、239页。

军委会为委员会制，除委员长外，设委员 7—9 人，下辖办公厅及一至三厅。^① 此时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尚较为简单，实际无法指挥和统率全国军队。作为委员长的蒋介石特将原属国民政府直辖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参议院归入军委会。军政部和海军部因属行政院管辖，暂未划归军委会直辖。这些部门连同军委会一道，构成了战前的军事统帅部。

参谋本部成立于 1928 年 11 月，是军队最高参谋机关，“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其长官参谋总长“统辖全国参谋人员，监督其教育，并管辖陆军大学校及驻外使馆武官及陆地测量”。^②

训练总监部与参谋本部同时成立，其职能是“掌管全国军队及所辖学校教育，并国民军事教育事宜”。^③

军事参议院作为最高军事建议咨询机关，置将官级军事参议若干人，“平时专备咨询建议，并担任点验校阅演习及特派诸事宜，战时则选任为高级指挥官或其他重要职务”。^④ 军事参议院名义上与前两个部门鼎足而三，实际上重要性要低得多。

军政部是军事行政的最高机关，也成立于 1928 年 11 月，其职能是“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行政事宜”，下辖陆军、海军、航空、军需、兵工五署及总务厅、审计处等部门。基于《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及长期以来军令、军政分离的传统，军政部系行政院所属，但其实际地位和权力丝毫不低于直属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等三个部门。和北洋时期相比，军政部将过去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合二为一，其权力不可谓不大。军政部所属各署的规模也不小，其中以陆军、海军、军需三署为大，下设若干司。^⑤ 1932 年军委会成立时，海军署单独划出，成立直属国民政府的海军部。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1932 年 3 月 1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军事》（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 3 页。

② 《参谋本部条例》（1928 年 11 月 22 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军事》（1），第 47 页。

③ 《训练总监部条例》（1928 年 11 月 22 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军事》（1），第 59—60 页。

④ 《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条例》（1928 年 11 月 22 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军事》（1），第 81—82 页。

⑤ 《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条例草案》（1928 年 11 月 17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系统表》（1928 年 11 月 17 日），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 第三册 军政部》（1），台北，“国史馆”，1998，第 11—12、31—32 页。

1932—1937年，军事统帅部的组织由简单趋于复杂，部门之调整日趋合理。

资源委员会系由参谋本部在1932年11月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发展而来，于1935年与军政部兵工署资源司合并而成，其职责是调查和掌管中国的重工业。之后实际发展成为国民政府的重工业管理部门。铨叙厅由军政部陆军署军衡司改组而成，是全国陆、海、空军的人事机关。^① 政训处原属训练总监部，1932年升级为军委会直属，^② 是战时军委会政治部的主要前身，是国民党军政治工作的负责机关。

全国抗战爆发时，军政部和海军部已纳入军事委员会系统。^③ 原属于南昌行营的侍从室于1936年1月升级为军委会直属，是委员长蒋介石的秘书、幕僚和随从办事机构，机构精干，实权巨大。^④ 自海、空军离部单列后，军政部成为陆军的军事行政部门，历年编制均有变更，至全国抗战爆发时，其内部扩充了兵役、马政二司。^⑤ 兵役司的成立是军政部所有变化中最为重要的。兵役由科升司，对于十分关键的征兵工作，意义不言而喻。

战前军事统帅部的逐渐完备，对抗战的影响巨大：一方面，以军委会为主体的统帅部之组织涵盖了国防所需的各个方面，为应对全面战争做了一个制度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军委会及各部所属署、司、科，在战前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如铨叙厅对军队人事的整理，资源委员会对国防工业的启动，兵工署对轻重兵器的试制，兵役科（司）对征兵工作的准备等，均为全国抗战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其内部的缺陷和不足仍比比皆是，有待于战争爆发后做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以军委会为主体，尝试组建党政军一体化

① 戚厚杰等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第329—330页。

②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民革命建军史 第二部 安内与攘外》（1），台北，1993，第56页。

③ 《修正军事委员会系统表》（1937年7月10日），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 第一册 军事委员会》（1），第60、76页。

④ 参见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05—106页；《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98页。

⑤ 《修正军政部组织法草案》（1937年7月），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 第三册 军政部》（1），第130、144页。

的大本营，作为对日作战的最高统帅部。1937年7月末平津沦陷后，蒋介石确定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开始考虑，为了统制全国人力、物力，有必要设置统一的战时统帅部，组建大本营的计划遂被提上议事日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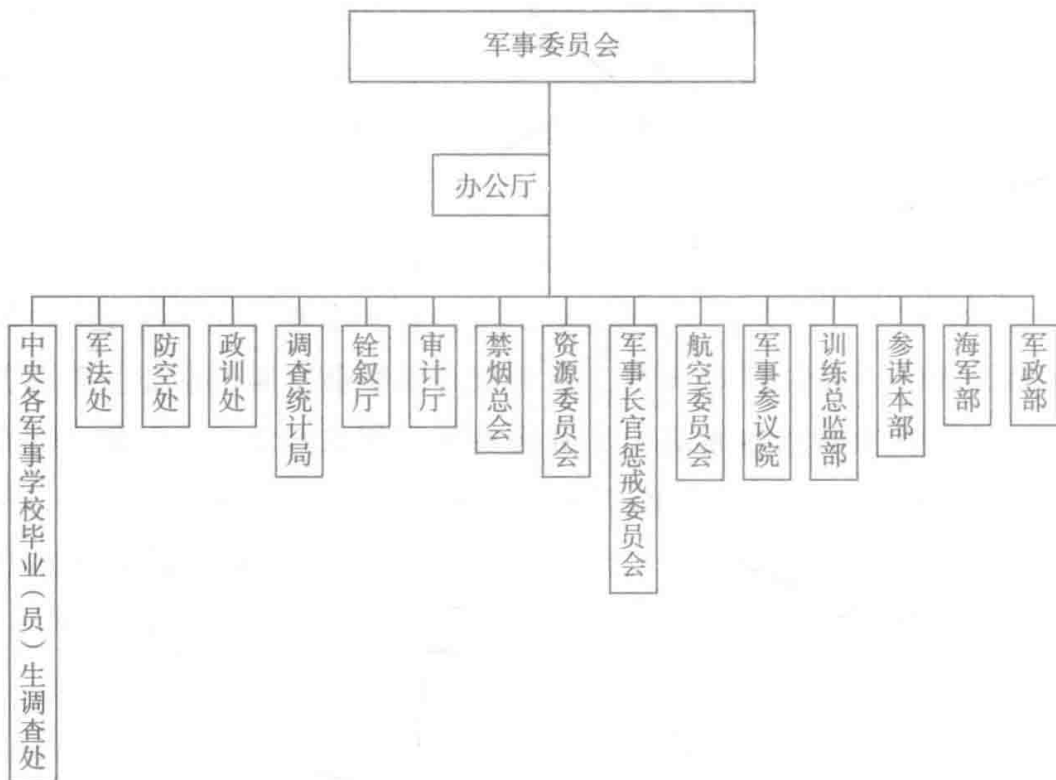


图 1-1 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军事委员会组织系统

资料来源：参见《修正军事委员会系统表》（1937年7月10日），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 第一册 军事委员会》（1），第76页。

经过短暂的谋划，大本营于8月20日正式建立。大本营的宗旨确定为统率陆海空军及指导全民，应对日本侵略。为达成“持久战”的目标，大本营之下成立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6部。第一部的任务为指导战区、预备军、后勤部应对战争；第二部的任务为内求社会安定，外谋国际同情；第三部的任务为安定金融，整理税务，紧缩支出等；第四部的任务为扩张产业，广辟资源，以做好自给自足的准备；第五部的任务为实行精神动员，昭告国际朝野；第六部的任务为组织、训练民众，防止汉奸。虽然各部任务的设定还比较粗率，但其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全面战争的原则，得以确立。

大本营乃建立在既有的军事委员会之上。原有的参谋本部、军政部、

^①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